

【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

青年人才何以助力乡村振兴

——基于“嵌入性—公共性”框架的分析

钟楚原¹, 李华胤²

(1.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厦门 361005; 2.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 武汉 430079)

摘要: 青年人才被赋予重建乡村振兴主体性的路径期待。以往研究仅关注青年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工具性方案和策略性逻辑, 忽视了作为人才支撑的青年主体如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隐机制和深层逻辑。本文围绕青年人才主体有效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 建构了一个青年人才嵌入性和公共性与乡村振兴绩效的关联分析框架。运用“嵌入性—公共性”的分析框架, 通过对闽南创业青年、浙东青年乡贤以及西南职业林农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 嵌入性掣动治理能力、公共性制约治理意愿, 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叠加影响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绩效。乡村振兴实践中的青年人才因治理能力及意愿张力呈现出不同类型主体失效和振兴绩效耗散, 共同根源在于嵌入性与公共性的失衡。为此, 异质青年人才在借道嵌入性提升治理能力的同时, 通过机制化搭乘进行公共性调适, 在形塑主体有效的基础上, 经由组织化运作将主体有效转化为治理有效, 最终促进不同面向的乡村振兴。

关键词: 青年人才; 乡村振兴; 嵌入性; 公共性; 组织化运作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7465(2023)01-0050-11

一、引言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 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在具体实践中, 由于诸多要素的制约, 青年人才建功乡村振兴尚面临一系列难题和挑战。总体而言, 当前学界对青年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呈现出四个面向: 一是从人才本体性出发, 重点考察青年人才的镜像类型^[1]、基本内涵和时代价值^[2]等, 在此基础上, 有学者对加快推进乡村青年人才振兴的政策意见进行了制度性反思, 如认为部分大学生村官存在将政策本身视为考公跳板以及无法融入当地的主体性脱嵌等弊端^[3], 提出构建嵌入性的人才培育理念^[4]。二是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维度出发, 对青年人才融入乡村振兴的责任伦理^[5]与实践路径^[6]进行探究, 主要探讨如何创新青年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如何优化乡村人才振兴的内生效果。三是对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青年人才实践困境进行研究。有学者提出以“离乡—返乡”^[7]的行动逻辑以及“市场—文化”^[8]的情感逻辑等回应顶层设计和实践中以“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为标准的人才通约性要求。四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某一类型青年人才与村庄治理的模式关系, 包括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市民化模式”^[9]和以返乡青年为主体的“创业潮模式”^[10]等。

收稿日期: 2021-12-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问责视角下新时代农民公共服务需求与精准回应研究”(21CZZ030); 华中师范大学学习贯彻落实湖北省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课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钟楚原, 男,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李华胤, 男,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整体而言,学界基于青年人才与乡村振兴所取得的成果颇丰,但略显不足的是,围绕前述主题所展开的多为怀揣理论预设或站在制度高位的人才对策性及碎片化研究,而解释性和整体性的分析相对阙如,尤其缺乏从乡村本位出发对青年人才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整体关联性探究,仅有少数学者对此作出尝试性努力。如夏柱智^[11]从乡村发展角度出发,认为回流并分布在乡村农业生产、非农业生产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中坚青年将在“五个振兴”路径中全面地、深入地发挥作用。吴晓燕和赵普兵^[12]认为作为乡村建设所需的人才,乡村振兴中鼓励乡贤返乡对推动农村产业转型与升级、建设文明乡风和实现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朱冬亮和洪利华^[13]则从乡村治理视角出发,认为大量青壮年外流背景下,返乡精英通过参与村治在重塑基层组织结构的的同时激活村庄发展动力,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力军。以上解释部分描述出青年人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宏观路径,但未能阐明相关路径得以生成的中间地带和微观机制。事实上,不论是碎片化视角下的离返乡、情感化等策略选择,还是关联性维度下的人才主体流失、内生动力不足等逻辑归因,均可归结为作为振兴主体的青年人才在村域结构位置中的嵌入性不足和公共性缺失,嵌入性与公共性的关联变动往往形塑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样态及振兴效能。为此,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将嵌入性理论和公共性理论引入乡村振兴实践场域,建立“嵌入性—公共性”的关联分析框架,试图探寻青年人才实现主体有效并助推乡村振兴的困境根源和运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助力乡村发展、改进乡村建设和优化乡村治理。

二、嵌入性与公共性: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一个分析框架

作为个体行动者的青年人才是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笔者将从个体行动者的实践逻辑出发,提炼作为有效治理主体需具备的嵌入性要素和公共性意涵,以此为基础,构建起青年人才实现主体有效并将其转化为治理有效,进而助推乡村振兴的关联性分析框架。

(一) 乡村振兴场域嵌入性与公共性

在嵌入性理论集大成者马克·格兰诺维特看来,区隔于低度社会化视角下因个人狭隘利益追求所导致的“个体原子化”以及过度社会化视角下行为模式被文化内置的“原子化行动”,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背后的意图嵌入社会关系具体且不断发展的系统^{[14]23}。乌兹进一步指出在嵌入性逻辑中,“行动者并非自利地追求短期目标”^[15],其行为逻辑更偏向于以培养长期合作关系为主的公共性意涵。而作为公共性理论的代表人物,贝拉同样认为,公共性是行动者超越个体工具主义下的狭隘逻辑堆砌并获致社会价值的基本路径,个人价值只有在基于“相互帮助、共同努力”^[16]的群体互动中才能得到彰显。群体互动的关系达成通常借道公共领域的实在性嵌入,即“共同世界借以呈现自身的无数视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17]。这就表明,嵌入性和公共性理论均认为个体行动得以超越原子化倾向和工具性自利的逻辑根源在于嵌入性和公共性对个体的二元共塑。基于此,本文拟在既有理论上构建“嵌入性—公共性”的解释框架,将其用于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场域分析。

嵌入性理论认为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其社会关系之中的^[18]。作为一种关系性指称,嵌入性通常被划分为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以及时间性嵌入。其中,关系性嵌入主要指称个体行动者的行动嵌入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19]。行动者通过与不同主体的良性互动实现自身的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用于分析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以及乡村社会的整体结构^[20]。行为主体通过对结构资源的能动借用来获取嵌入微观情势的结构弹性。时间性嵌入则在反对时间化约主义的同时,更加强调关系及社会网络结构过去的历史对今日情境的塑造^{[14]29}。行动者借助隐遁在“逝去”时间中的共同理解与情绪韵律,实现对区域情景的时间性嵌入进而获致行动的合情空间。该语境下,青年人才的嵌入性实质指代乡村振兴实践场域中,

青年人才与村民、村两委及村庄等多元主体关系。青年人才通过对村民等的关系性嵌入、村两委等权力体制的结构性嵌入以及基于村庄情感连带的时间性嵌入来实现自身良好的嵌入性。

与此同时,区隔于个人性、私密性,公共性强调的是某种事物与公众、共同体相关联的一些性质^[21]。该层意义上,公共性被赋予开放、平等与社群等特性,并通过“特定共同体成员理性、自觉的交互主体性行为与结构性活动而得以存在”^[22],由此形塑了公共性的实践维度。相较于理性交互行为开拓出的实践公共性,哈贝马斯所讨论的介于国家系统与私人领域之间调节公共舆论和形成公共意见的“公共领域”^[23]更偏重言论维度公共性。不宁唯是,公共性还涵括价值维度的公共精神^[4]。在乡村振兴实践场域,青年人才藉由实践维度的公共事务参与、言论维度的公共利益表达和价值维度的公共精神传递实现公共性再生产,其实质就是“个体基于理性精神参与公共活动、维护公共利益和价值取向的过程”^[24]。

(二) 分析框架:青年人才的嵌入性、公共性与乡村振兴

青年人才的嵌入性包括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时间性嵌入,依次体现为其与村民、村两委、村庄的关联程度,关联越紧密则嵌入性越高,反之越低。其中,关系性嵌入根源于青年人才与村民群体的持续有效交互。青年人才的关系性嵌入越强,则越能有效获取村民信任和引导公共参与。结构性嵌入则指青年人才与村级权力结构的有效关联状况。青年人才与村两委保持融洽的关系,表明青年人才具备高结构性嵌入。结构性嵌入越高,青年人才越能获取村庄动员以及资源转置的合法性身份。此外,时间性嵌入主要反映青年人才与村庄的情感连带。时间功效来自它在实践中起作用的关系结构状态,去时间化容易把行为人降格为能动性缺失的自动木偶或惰性物体,而时间性嵌入则有助于提升青年人才有效适应村庄微观情势的能力。时间性嵌入越高,则青年人才更易在复杂村治环境中平衡结构性深嵌和关系性浅嵌所滋生的张力,并藉此获取行动的合情空间。概言之,青年人才的嵌入性愈高,在实现信任生产、动员公共参与、促进资源转置和拓展行动合情空间等方面的能力优势越显著。以上诸方面亦是作为乡村振兴有效主体最为重要的能力体现。故嵌入性越高,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治理能力越强。

与此同时,青年人才的公共性本质在于作为治理主体的青年人才依据治理目标或愿景,而进行的公共利益表达、公共事务参与和公共精神传递。乡村振兴的目标就是为了积累公共利益促进乡村发展、引导公共参与推进乡村建设和传递公共精神改进乡村治理。可见,青年人才的公共性意涵与乡村振兴的愿景目标导向相一致。那么,青年人才的公共性如何与乡村振兴主体有效性相联系呢?事实上,外部培育的青年人才公共性首先在于形式上的公共性建构,诸如借道体制化机制将青年乡贤转为瞄准乡村治理的村两委成员,或依托市场化机制将创业青年变为带领乡村发展的“领头雁”,抑或是借道社会化机制将青年转变为振兴乡村建设的“职业经理”。借助形式公共性变更催生的合法性倒逼,青年人才在拓展公共利益表达、公共事务参与及公共精神传递的主观意愿过程中获致实质公共性,并藉此进一步夯实其作为有效乡村振兴主体的合法性基础。简言之,青年人才公共性越高,其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越强。值得一提的是,体制化、市场化及社会化机制只是典型青年人才适应复杂村治场景的弹性策略选择,彼此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绑定关系,相关机制亦无法穷尽全国所有地区的经验表达,关键是其中逻辑的通约性,即通过对不同机制的弹性适用以实现对青年人才公共性的形式化调适和实质性生长。

可见,青年人才的嵌入性影响其助推乡村振兴的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具体影响机制在于,嵌入性与治理能力、公共性与治理意愿分别成正向相关,即青年人才的嵌入性和公共性越高,其治理能力及意愿相应越强。基于“嵌入性—公共性”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乡村振兴实践场域中的青年人才难以成为有效治理主体的关键即在于嵌入性与公共性的结构性失衡,以及由此导致的治理能力及意愿的连带性偏差。其中,高嵌入性、低公共性的治理主体基于治理意愿缺失易形成参与冷漠,低嵌入性、高公共性的治理主体基于治理能力不足易形成参与

无序,低嵌入性、低公共性的治理主体基于治理能力及意愿的双重匮乏易形成参与排斥(边缘化)。只有高嵌入性、高公共性的治理主体才能在强治理能力及意愿的双向推动下助力乡村发展、改进乡村建设和优化乡村治理。那么,存在结构性失衡的青年人才是如何实现高嵌入性与高公共性再均衡,进而优化乡村振兴的治理绩效的呢?从绩效优化来看,达致结构均衡的青年人才成为有效治理主体,但是基于个体有限理性束缚,将主体有效转化为治理有效同样需要借助特定机制的再运作。对此,组织设计通常被认为“有助于克服‘有限理性’的困境”^[25]。该背景下,基于高嵌入性和高公共性而达致主体有效的青年人才,还需借助组织再运作机制实现乡村振兴效能的有效转化。青年人才嵌入性、公共性与乡村振兴的关联分析框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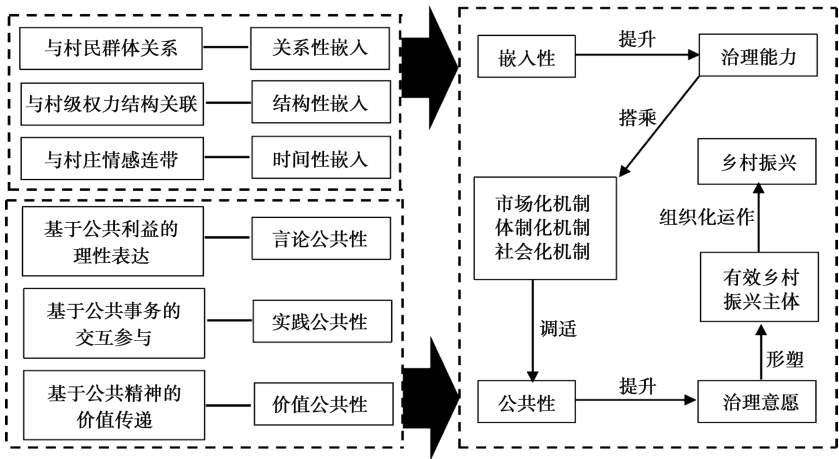


图 1 青年人才嵌入性、公共性与乡村振兴的关联分析框架

三、青年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类型学呈现

本研究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所在调研团队于 2018—2020 年在闽南、浙东和西南地区的长时段田野调查。在选择典型案例时,考虑到“最大相似”与“最大差异”原则^[26],既要寻找导致作为同质案例的以人才助推乡村振兴实践总体差异性的少数变量,以延伸案例解释的外部有效性,又要尽可能地对差异化的人才实践案例进行对比以提高观察关系的内部有效性。以此为标准选择闽南 YQ 社(自然村)、浙东 CH 村和西南 XY 村^①为代表的三类乡村社区,同时处于城乡结构失衡而导致的人才要素单向度流失环境中,但彼此又分置东西、底色各异,市场发育程度不一且文化类型多样,由此形塑的青年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类型各异。本文的研究方法为深度访谈和资料搜集,所收集的资料包括:一是对各类青年人才、乡镇干部、普通村民等的无结构访谈;二是受访对象提供的相关文字资料和新闻报道等。

(一)“低嵌入性-低公共性”:返乡创业青年的市场化机制

闽南地区城市化较快,市场经济活跃。这种经济结构笼罩下的个体行动更具有创造性,该区域也成为返乡创业青年助推乡村发展非常普遍的地区。其中,YQ 社地处厦漳经济文化核心圈,创业氛围浓厚。同时作为传统宗族村落,YQ 社 90% 以上村民为颜姓,以颜氏长老为核心的宗族治理传统留存完好,其主要致力于族内公共治理,而对非颜姓村民群体形成排斥,由此形塑了后者的低公共性。随着城市化的加速,青壮年村民大量外流,村内常住人口仅 756 人,流动人口多达 200 余人,YQ 社外流的青年对村域社会形成事实上的脱嵌状态。更为显著的是,新态势下留守村庄的颜氏宗亲在治理混姓村庄时,其公共性劣势亦进一步凸显,作为共同体的宗族传

① 按照学术规范,本文中出现的地名、人名等均已做匿名化处理。

统日趋消解。当“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项目资源大量下沉时,YQ社进一步陷入政府越位、村委失位、村民缺位的尴尬境地。该背景下,初中毕业便外出打工以贴补家用的CJX,依托门窗经营攒下第一桶金。节日回乡探亲期间,他发现留村青年因缺乏发展平台而整日游荡,在相互倾诉中儿时伙伴均寄望于其返乡带领大家共同发展。

从过去得到的共同理解与感情开始,CJX联合外出伙伴以要素入股方式成立合作社,并根据村庄生活习惯建立共餐共议制度,以化解开会不守时难题和加深日常感情联系。在加强时间性嵌入的同时,CJX将合作社打造成桥接村庄与外部市场的开放式平台,这不仅吸引大批分散项目集中配置到村社内部,还为多元主体建言及参与YQ社发展搭建了制度化通道。以城市菜地项目为例,借助平台经济链入现代市场交换体系的村民纷纷将地租给合作社,经验丰富的菜农亦积极向合作社提供菜地管理建议,还为前来体验耕读乐趣的城市会员提供技术指导。由此不仅实现每亩种菜年收入8万元的跨越式增长,还接待周边游客近5000名,为发展乡村旅游打下产业基础。YQ社案例中,低嵌入性、低公共性的返乡创业青年,经由村庄情感连带的时间性嵌入增强治理能力的同时,利用市场化的平台经济助推多元主体实践及言论公共性提升,进而增强乡村产业发展意愿的机制被笔者概括为市场化机制。

(二)“低嵌入性-高公共性”:青年新乡贤的体制化机制

浙东地区赓续越地文脉,乡贤文化厚积,青年乡贤返乡参与乡村治理成为该区域最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实践场景。CH村位于浙东上虞,乡贤反哺家乡传统兴盛。整个村庄由中区、大丘畈、新村三个自然村组成,为道墟第一大行政村。村内沙地广布,受曹娥江涨水、倒地、倒塘的影响,村民整体生活困苦,很多村民青壮年时期便外出谋生,对村庄呈现出事实上的脱嵌状态,村庄一时陷入无序治理。经过一系列行政变革,CH村并入道墟镇,现隶属于道墟街道。调整后的行政区划及党委设置产生了更多的村干部职位,道墟街道积极实施能人回村政策,为重新吸纳热心家乡发展的外出乡贤提供了体制化平台。

CH村的青年乡贤XHX 15岁便外出谋生,在服装、餐饮、建筑等行业取得一些成就,改变村貌和获得村民认可的愿望一直被繁忙的工作所湮没。此后,基于人大代表的政治声誉和道墟街道的多次邀请,XHX回馈乡里的价值诉求被重新点燃。恰遇2015年基层换届选举,青年乡贤XHX在相关政策感召下返村参选,当选为CH村党总支书记。担任书记以后,XHX主动将任职误工补贴连同部分家庭积蓄投入成立了10多万元的个人基金,用于为集体添置基本办公设备和以村两委的名义奖教助学。在实现私性资源公共性转置的同时,XHX依托在村两委中的结构性位置,获得动员村庄力量投入乡村治理的合法身份。通过带头捐资,XHX号召本村16位乡贤共同成立乡贤理事会,理事会将认捐资金年息收益的3%用于组建配套的乡贤基金会,主要用于大病救助、福利保障和乡风文明等文化公益事业。在文化公益中获得更大合法性认同的XHX,依托业已完善的乡村文化网络实现对全体村民更广泛的实践公共性吸纳。修建文化礼堂期间,党员干部协同村民主动义务做工累计近5000工时,建成的文化礼堂又为吸引全体村民开展文娱展演提供了场地支持,在移风易俗中优化了乡村治理。CH村案例中,低嵌入性、高公共性的青年乡贤通过对村庄权力体制的结构性嵌入,在实现治理资源及能力公共性转置的同时,进而利用体制化身份实现对全体村民更大的实践公共性吸纳并提升其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机制,被笔者提炼为体制化机制。

(三)“高嵌入性-低公共性”:青年职业林农的社会化机制

西南地区林业资源丰富,广大林农形成以林为主的生计模式,随着林权改革逐步铺开,以新型职业林农为代表的青年人才广泛参与乡村生态建设实践。XY村位于崇州市道明镇,呈“四山一水五分田”的地理格局,2014年被列入第二批全国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区。受地震影响,包括XJ家在内的XY村林农已迁至新村集中居住,同年在对外经商多年的XJ父亲XZC因金融危

机返乡务农,2011 年 XZC 成为崇州第一代农业职业经理人。现代居住空间的集聚变迁为密切 XJ 一家与其他林农交往提供了嵌入性契机,而传统公共空间的消解又在林农个体中制造了新的公共性危机。二者双重作用下的林农群体呈现出高嵌入性、低公共性的实践特征,在生产作业半径扩大化的叠加影响下,青年林农参与林业生产以获取经济社会效益的治理意愿被削弱。因此,受过高等教育的 XJ 随夫离开自小生活的 XY 村,在成都某民企担任出纳以维持生计。崇州市推行生态涵养主体功能区的管制政策,导致都市现代林业发展面临生态上山、林农进城的现实张力,这进一步加剧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主体缺失困境,加强新型职业林农培育迫在眉睫。

培育职业林农的前提在于加强青年林农的职业回引。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展,XZC 希望女儿 XJ 回来帮助他提升规范化经营水平。由于与第一代农业职业经理的父亲的长期互动,XJ 对林农职业前景的认识有了全新改观,并决定返乡经营林业。依托父亲 XZC 的关系性嵌入,XJ 得到林农信任并顺利当选林地股份合作社的职业经理。XJ 通过产权改革有效激励 106 户林农以 1101.3 亩林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并与社员约定 1 : 2 : 7 的剩余收益分配机制。在与林农结成紧密利益关联的同时,XJ 通过崇州市政府搭建的林业科技服务平台将传统林农纳入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林下药材种植技术引进为例,负责药材管理的社员藉此获得专家无偿的技术指导和公共服务,并自觉以远低于市场的劳务价格为经济困难的合作社提供森林管护和防火监测等必要服务。2017 年,股份合作社在共建共营中户均增收 4100 元,真正实现为林农而建的乡村生态建设目标。XY 村案例中,高嵌入性、低公共性的青年林农经由关系性嵌入成长为致力现代林业建设的职业经理,借助社会化服务体系增强林农价值公共性取向的同时,优化其参与乡村生态建设意愿的机制被笔者概括为社会化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三个案例分别对应于“嵌入性-公共性”分析框架中存在结构失衡的三种青年人才如何成为乡村振兴有效主体的理想类型,第四种青年人才因业已达致“高嵌入性-高公共性”的主体有效状态,故未引进案例进行描述与分析。不过,从研究的完整性和严谨性角度出发,笔者尝试对其可能的实践形态及运行逻辑进行简要交代。乡村振兴实践场域中的“高嵌入性-高公共性”青年人才是经由市场化机制培育的返乡创业青年、借道体制化机制成长的青年新乡贤、搭乘社会化机制造就的青年职业林农,抑或是无须借助机制搭乘的“纯天然”在地文化权威(乡村青年教师)等。其实践形态的共通点在于高嵌入性及高公共性,并藉此形成助推乡村振兴的强治理能力及意愿。以乡村青年教师为例,从在外求学到返乡教学的在地化过程中,青年教师逐渐演变为长期生活在村的文化人,不仅在教学活动中与村民家长保持良好的关系互动,还对教学点所在村庄具有较高的情感连带,同时其基于文人传统而热心公共利益表达、公共事务参与和公共精神传递,依凭强治理能力及意愿极可能成长为嵌入村治结构并助推乡村善治的中坚力量。

四、青年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运行逻辑

基于对闽南 YQ 社、浙东 CH 村、西南 XY 村等地青年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困境及实现机制分析,以及通过对返乡创业青年、青年乡贤、青年职业林农进行个案内的纵向变迁比较以及案例间的横向实践分析,追溯不同类型青年人才成为乡村振兴有效主体的制约根源所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达致主体有效的青年人才何以助推乡村振兴的运行逻辑。

(一) 案例比较分析:青年人才如何成为乡村振兴的有效主体

青年能人返乡创业前,村内颜姓宗族权威嵌入性较高。该类权威内生于村域社会,与普通村民关联较强,具备高关系性嵌入;同时依托族训乡情等宗族传统实现对村庄共同体的高时间

性嵌入。随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宗族权威凭借“人的依赖关系”所形成的高嵌入性因遭遇市场经济的物化倾向而面临个体原子化、情感断层化等困境,未能有效转化为强治理能力。惦念家乡的 CJX 回归后,目标不再局限于一姓一族的复兴,而是以时间性嵌入为抓手,通过平台经济等市场化机制搭建公共平台、吸纳公共参与,联合村内外群体致力于共同缔造美丽 YQ 社。闽南 YQ 社案例中,经由时间性嵌入的返乡创业青年在提升治理能力的同时,基于市场化运作实现多元主体公共性生长和治理意愿增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遭遇嵌入性危机的传统宗族权威进行治理能力补位,形塑了积极有效的乡村产业发展主体。

青年乡贤体制化以前,长期不在村居住,与 CH 村民的日常关联偏低,因而关系性嵌入不足。此类青年乡贤因劳动分工中的非农结构位置,其社会网络整体被排斥在村庄既有结构之外,因而结构性嵌入不足。但受乡贤文化的潜在影响,青年乡贤仍以公共责任为核心的自有性行为为主,因而始终呈现出高价值公共性诉求,参与村庄治理意愿偏高。青年乡贤体制化以后,嵌入性和公共性均得到大幅提升。通过嵌入村庄正式权力结构,青年乡贤的私性身份发生公共性转向,为其将个体层面的配置性资源转化为村庄建设层面的权威性资源提供制度化渠道。浙东 CH 村案例中,经由结构性嵌入的青年乡贤得到体制化激励、扩张实践公共性的同时,治理能力及意愿同步增强,为其吸纳更多村民参加乡村公益事业、加快村级文化建设、修复乡贤文化网络提供条件,由此生产了在场可得的乡村文化治理主体。

青年林农返乡经营林业以前,搬迁后相对聚合的村落空间形塑了林农整体的高关系性嵌入。XJ 作为本村长大的村民,对村庄具有高时间性嵌入。但是,作为自利个体,XJ 的整体公共性一般,高等教育以及国家政策双重激励下的“一懂两爱”价值公共性尚处于隐性状态。XJ 的个人所学还没有转化为乡村生态建设意愿及能力。依托关系性嵌入,XJ 获得 XY 村林农支持,进而通过扩大林农参与、组建股份合作社,提升带领全体林农建设现代林业的能力。以此为基础,借道林业共营制,XJ 不仅与全体林农结为利益共同体,还将后者纳入社会化服务体系,使自利性个体转化为甘愿为合作社做出必要牺牲的社会化群体。西南 XY 村案例中,藉由关系性嵌入和社会化机制,青年职业林农和传统林农的价值公共性得到生长,有效提升其发展现代林业意愿的同时,塑造了社会可及的乡村生态建设主体。

三类案例中,差异化的实践机制共同指向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所共有的主体有效性不足症结(表 1)。

表 1 不同类型青年人才成为乡村振兴有效主体的机制比较

人才类型	嵌入前			嵌入后			
	嵌入性	公共性	主体有效性 (以下简称有效性)	嵌入性	培育机制	公共性	有效性
返创青年	低	低	弱能力-弱意愿 有效性偏低	时间性嵌入↑	市场化机制	言论及实践 公共性↑	能力意愿 均衡下的 主体有效
青年乡贤	低	高	弱能力-强意愿 有效性受限	结构性嵌入↑	体制化机制	实践 公共性↑	
青年林农	高	低	强能力-弱意愿 有效性难发挥	关系性嵌入↑	社会化机制	价值 公共性↑	

不同类型青年人才在嵌入乡村振兴实践场域以前,其嵌入性和公共性均无法达致高水平均衡,进而导致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及意愿偏低,作为乡村振兴主体其有效性不足。通过有选择地借道时间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关系性嵌入提升治理能力,同时策略性地辅以市场化、体制化及社会化机制,促进公共性生长并增强治理意愿,形成“高治理能力—高治理意愿”的均衡,继而改善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有效性。市场化、体制化和社会化三类不同实践机制,运用场景存

在差异:市场化机制主要针对嵌入性和公共性双重偏低的返乡创业青年如何实现对高嵌入性、低公共性的宗族权威进行能力补位的实践困境;体制化机制主要针对青年乡贤基于劳动分工而导致的嵌入性不足难题;而社会化机制主要针对青年林农成长为新型林业职业经理人所面临的能力转化困境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林农的公共性偏低难题。

(二) 组织化运作的保障:青年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运行逻辑

通过机制嵌入的青年人才形成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高水平均衡的乡村振兴有效主体,但要将主体有效转化为治理有效并实现不同面向的乡村振兴,还需借助组织的资源配置和结构功能来增强其可靠性。下文将进一步探究青年人才促进乡村振兴的组织化保障机制。

闽南 YQ 社案例中经时间性嵌入的返乡创业青年,借助市场化组织筑巢引凤,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开放式平台经济的主体性,进而在产业振兴中共同缔造美丽 YQ 社。一方面,返乡青年 CJX 借助合作社的制度化加工优势,加强对不同族姓青年的置信强化与组织动员,如创业经验丰富的 YZM 经合作社动员,主动参与 YQ 社乡村旅游产业项目。另一方面,CJX 依托合作社桥接村庄与外部市场的结构洞位置,系统收集、加工和分享市场信息,实现对村内外资源的组织化吸纳,不断拓宽多元主体参与 YQ 社建设的制度化渠道,改变村民群体“等靠要”思维的同时,激发市场主体投资意愿,有效聚合乡村发展力量。闽南 YQ 社返乡创业青年借助市场化的合作社组织再运作,取得良好治理绩效,包括激发不同族姓青年的内生主体意识、提升其对村庄建设的热情,激活村内外要素资源、增强乡村产业发展动能。

浙东 CH 村案例中经结构性嵌入的青年乡贤,依托体制化组织,激发村民内生动力、修复传统文化网络以及振兴乡村文化。首先,青年乡贤通过体制化组织将自身拥有的配置性资源和结构赋予的权威性资源进行公共性转置。XHX 担任村书记以后,不仅以村委名义带头捐资用于奖教助学,还通过村委会向上争取政策资金修建信义广场。其次,XHX 以建设文化礼堂为切口,依托村两委的体制支持和乡贤基金会的资金帮扶,成功带动党员干部、村民群体参加村庄文化建设。最后,XHX 借助体制化组织凝聚乡贤文化价值,号召 CH 村 50 名企业家、老党员等组建乡贤理事会,共同致力传统节日、文娱习俗等村庄公共文化重建。浙东 CH 村青年乡贤借道体制化组织运作,既有效提升村级文化治理的资源增量,又充分激活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存量,切实增益乡村治理实效。

西南 XY 村案例中经关系性嵌入的青年职业林农,运用社会化组织推动传统林农职业化转型,促进传统林业现代化升级,进而在稳妥推进生态建设中实现林农主体性激发和林业共赢式发展。首先,青年职业林农利用森防专业合作社等社会化组织的服务托管功能,在满足林农多样化服务需求的同时,推动林农职业化发展。其次,他们通过“一校两院”等林业科技组织的技术赋能,形成林业科技组织、林业职业经理人以及职业林农三位一体的林业科技服务体系,在产学研融合发展中促进林业转型升级。最后,青年职业林农借助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以及村级互助担保合作社,在明晰林权归属的同时,加强林权抵押风险防控,借助产权激励功能全面激活林农建设现代林业的主体动能。西南 XY 村青年职业林农,借助社会化的组织服务体系,获致的乡村建设成效,包括实现林业现代化转型、林农主体性激发以及乡村生态振兴。

进一步比较三类青年人才促进乡村振兴的组织化保障机制(表 2)。市场化后的返乡创业青年借道股份合作社的制度加工及结构洞位置优势,达到了激发村民主体意识、激活村内外要素资源和增强乡村产业发展动能的效果。体制化后的青年乡贤,依托村两委的资源公共转置、村民公益动员及文化价值凝聚等功能,实现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性激发、文化网络的结构修复和乡村治理的整体性增效等。社会化后的青年职业林农搭乘高度开放的社会组织体系,并通过后者的服务托管、技术赋能、产权激励等功能,获致了林农主体性激发和林业共赢式发展的乡村生态建设稳妥推进成效。概言之,三类青年人才均需借助一定的培育机制才能转化为乡

村振兴有效主体,在此基础上依托组织化运作,最终促进不同面向的乡村振兴。其中,市场化机制的返乡创业青年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体制化机制的青年乡贤促进乡村文化治理,社会化机制的青年职业林农促进乡村生态建设。

表 2 不同类型青年人才促进乡村振兴的运行逻辑比较

人才类型	组织运作	实践机制	治理成效	成效类型
返创青年	市场化组织	制度加工势能 结构洞位置优势	激发主体意识、激活要素资源、增强产业动能	促进乡村发展
青年乡贤	体制化组织	资源转置、公益 动员、价值凝聚	内生动力激发、文化网络修复、乡村文化振兴	改善乡村治理
青年林农	社会化组织	服务托管、技术 赋能、产权激励	林农主体性激发 林业共赢式发展	推进乡村建设

五、基本结论和政策启示

村治场域中的人才主体性支撑作为基本事实而被纳入中国乡村建设的长周期议程。当前,基于青年人才与乡村振兴的关联性研究,大多聚焦于由上及下的政策关照视角,倾向于站在政策高位或怀揣理论预设的对策性或碎片化表达,藉此形塑的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实践通约性想象,不仅容易脱离“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的乡村本位立场,而且存在理论过度裁剪丰富实践经验的可能。更为关键的是,由碎片化表达所衍生的即时性偏好充斥的相关研究,往往表征为将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全貌化约为促进乡村发展、改进乡村建设或推进乡村治理等截取的运行片段,这无形中消解了青年人才作为能动个体适应复杂情势的主体弹性,也相当程度遮蔽了以人才助推乡村振兴过程的时间延展性,无法完整呈现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样态、运行逻辑与切实效果。作为有益补充,本文通过将青年人才与乡村振兴相关联,尝试立足乡村本位全面积累相关经验事实,在使经验分析有效契合促进乡村发展、推进乡村建设、改进乡村治理的完整政策情境的同时,相关分析工作亦应真正融入农民生活情态、村庄复杂情势和乡村本位情境而得以拓展青年人才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中层理论增量。

本文围绕青年人才主体有效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建构了一个青年人才嵌入性、公共性与乡村振兴绩效的关联分析框架。通过对闽南创业青年、浙东青年乡贤以及西南青年林农的田野观察发现,青年人才的嵌入性包括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以及时间性嵌入,公共性涵括实践、言论、价值等维度。其中,嵌入性掣动治理能力、公共性制约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叠加影响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绩效。青年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困境根源于嵌入性与公共性的失衡,并分别表征为“低嵌入性-低公共性”“低嵌入性-高公共性”“高嵌入性-低公共性”所引致的主体失效和乡村振兴绩效耗散。为此,创业青年、青年乡贤和青年林农分别依托时间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关系性嵌入提升治理能力,借道市场化机制、体制化机制、社会化机制生长不同维度公共性的同时强化治理意愿,在形塑高治理能力及意愿的有效乡村振兴主体基础上,通过搭乘市场化组织、体制化组织、社会化组织将主体有效转化为治理有效,促进乡村发展、改进乡村治理和推进乡村建设。

当然,闽南创业青年、浙东青年乡贤以及西南职业林农的典型经验不可能涵括所有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模式,关键是其所表征的逻辑通约性,借助对典型案例的解剖,至少能够阐明不同青年人才能够依托“嵌入性—公共性”方案,在实现主体有效的基础上促进不同面向的乡村振兴。从政策可及性看,政府在将“嵌入性—公共性”理念纳入顶层设计并用于指导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遵循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的实践原则。一方面,基于横向实践

层面的人才主体及应用场景差异性,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实践原则,包括对人才嵌入性方案、适用性机制及组织化载体的灵活挑选。另一方面,在以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纵向普遍结构上,可依次借助时间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分别让青年人才“想回去”“回得去”以及“留得住”。具体包括,借助乡土情感等柔性时间嵌入,增强青年人才的自主回引意愿,以此为基础,通过对村两委、人大政协等的结构性开放,为具备返乡意愿的青年人才搭建参与乡村振兴的立体化通道,不宁唯是,通过市场化等机制组建效用互涵的利益共同体,增进返乡青年人才长期服务乡村振兴的关系联结基础。

参考文献:

- [1] 陶自祥.乡村振兴与农村青年群体类型的价值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21(3):66-72.
- [2] 王婷.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时代新人培育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1(5):42-47.
- [3] 刘义强.大学生村官政策的成就、挑战与未来方向[J].人民论坛,2018(3):79-81.
- [4] 龚丽兰,郑永君.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J].中国农村观察,2019(6):59-76.
- [5] 王兴周,庞嘉楠,李岩崇.家庭责任伦理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J].青年探索,2022(6):85-97.
- [6] 李海金,焦方杨.乡村人才振兴:人力资本、城乡融合与农民主体性的三维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6):119-127.
- [7] 罗敏.从“离乡”到“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基于H省Z市1231名青年的问卷调查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9(9):11-17.
- [8] 胡小武.市场理性与文化乡愁: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青年镜像与群体心态[J].中国青年研究,2019(9):5-10.
- [9] 徐勇,张慧慧.规划性变迁视角下的农民工走向与对策[J].理论与改革,2021(2):53-62.
- [10] 古川,尹宁,赵利梅.社会网络与产业生态交互赋能下青年返乡创业的演进机制[J].农村经济,2021(9):128-134.
- [11] 夏柱智.“中坚青年”和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兼论青年研究视角的优势[J].中国青年研究,2019(8):34-41.
- [12] 吴晓燕,赵普兵.回归与重塑:乡村振兴中的乡贤参与[J].理论探讨,2019(4):158-164.
- [13] 朱冬亮,洪利华.“寡头”还是“乡贤”:返乡精英村治参与反思[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49-57.
- [14] 马克·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M].罗家德,王水雄,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 [15] Uzzi B.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The Network Effect[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61(4):674-698.
- [16] 罗伯特·N.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M].翟宏彪,周穗明,翁寒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10.
- [17] 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M]//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88.
- [18]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46.
- [19] 于海龙,胡凌啸,林晓莉.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需要何种媒介[J].经济学家,2022(9):108-118.
- [20] 张陈一轩,任宗哲.精英回乡、体系重构与乡村振兴[J].人文杂志,2021(7):113-121.
- [21] 谭安奎.公共性二十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
- [22] 袁祖社.“公共性”的价值信念及其文化理想[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21(1):78-84.
- [23] 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M]//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26.
- [24] 黄晓春.中国社会组织成长条件的再思考——一个总体性理论视角[J].社会学研究,2017,32(1):101-124.
- [25]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66.
- [26] 伯努瓦·里蒙克斯,查尔斯·C.拉金.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M].杜运周,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19.

How Young Talents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Embeddedness-publicity

ZHONG Chuyuan, LI Huayin

Abstract: Young talents are given the path expectation of reconstruc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revious studies only focused on the instrumental scheme and strategic logic of young talent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gnoring the implicit mechanism and deep logic of how young subjects as talents supports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Focusing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young talent subject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governance,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correlation analysis framework between the embeddedness and publicity of young talent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performance. Us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mbeddedness-publicity”,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of the young entrepreneurs in southern Fujian, the young rural elites in eastern Zhejiang and the professional forest farmers in southwest China, it was found that embeddedness drives governance capacity, publicity restricts governance willingness, and the superposition of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governance willingness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of young talents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Young talent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practice show different types of subject failure and revitalization performance dissipation due to the tension of governance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and the common root lies in the imbalance between embeddedness and publicity. Therefore, the heterogeneous young talents can improve their governance ability by embedd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n carry out public adjustment through institution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shaping the main body, they can effectively transform the main body into effective governance through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and final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Keywords: Young Talents; Rural Revitalization; Embeddedness; Publicity;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